

## 网络时代的政府治理专题

[编者按]:2013年是网络社会的政府治理面临巨大挑战的一年,网络社会中如何推进政府治理,如何推进政府治理网络又一次成为了年度性热议话题。自创刊伊始,本刊就一直关注网络时代给公共治理带来的各种挑战,并试图能够从学术上廓清网络社会的政府治理规律,本刊此次推出“网络时代的政府治理”专题,进一步探索在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政府公信力与政治信任度的促进因素、政府网络服务绩效现状、政府2.0在全球扩散的主要因素等问题。

通过不同路径的实证性探索,本专题发现,网络语境中政府透明性和回应性的提升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增强有着积极影响;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从省级(含副省级)城市政府来看,我国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各地政府的网络服务绩效依然不够理想;政府规模、财富状况、电子服务和电子民主等政府资源与能力因素是驱动政府2.0在全球扩散的主要因素。我们希望,这些发现能对促进我国网络社会的公共治理绩效有所助益,对我国推进全面改革有所助益。

#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

## ——一项经验性研究

● 张明新<sup>1</sup>, 刘伟<sup>2</sup>

(1.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武汉 430074;2.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摘要:**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

**关键词:**媒体;政治信任;互联网;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D6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14)01-0090-14

### 1 引言

我国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断裂与固化、公民权利意识增强、民间话语空间的活跃和群体性事件频发,公众政治信任持续下降已是明显事实。近年来,在许多公共事件中,常出现公众

对政府的质疑和追问,甚至“对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sup>[1]</sup>,社会舆论“一边倒”,引导事件发酵升级,极大消耗政府的公信力。2011年2月,前总理温家宝在与网友交流时明确表示:“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sup>[2]</sup>随后在短短数月,《人民日报》连续撰文讨论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全方位重塑政府公信力”、提振“沉没的权威声音”。可见,政治信任已是当今时代的重要课题。

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中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广阔的进程,包括多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媒体为其中之一。在西方,许多研究揭示出媒体

收稿日期:2013-09-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XW046)

作者简介:张明新(1978-),男,毕业于武汉大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媒体的采用与社会政治影响,E-mail:mingxinzhang@hust.edu.cn;刘伟(1978-),通讯作者,男,毕业于复旦大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基层政治与当代中国政治。

对政治事务的报道,尤其是对政治丑闻的曝光影响公众对政府、国会、总统、警察等政治机构和人物的信任水平;同时,媒体使用也嵌入进社会政治结构中,通过其他中介变量,如社会资本而塑造政治信任状态<sup>[3-4]</sup>。在我国,媒体管理体制与西方不同,媒体最重要的功能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要求<sup>[5]</sup>,在行政、人事、编辑方针等多方面受严格管制,部分媒体甚至被视为政府机构在社会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然而,迄今还未有研究揭示我国媒体在公众政治信任机制中扮演的可能角色。

随着新兴媒体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媒体生态正在发生急剧变革,对信息传播的过程和后果产生深远的社会政治影响。在我国,互联网愈来愈成为网民了解公共事务的主导信息结构,成为他们交流、表达政治观点和付诸政治行动的重要平台。近几年,许多基于互联网传播的公共事件,由于信息公开不及时与传播阻滞,不少民众“将获得事实真相、表达自身诉求的希望寄托于网络,通过互联网表达不满,质疑政府行为的真实性和公平性”,被认为直接导致了“对政府信任度的大幅下降”<sup>[6]</sup>。在舆情热点事件中,公众在网上对政府的种种质疑,以及大量恶搞式山寨政治文化的流行,似乎表明公众对互联网的使用正在消解他们的政治信任<sup>[1]</sup>。

本土学者对政治信任的理论和经验考察,还未将媒体作为考量因素。实际上,“虽然政治信任问题在西方得到学界的广泛研究和关注,但目前对中国的政治信任的研究并不多”<sup>[7]</sup>。政治信任是重要的执政资源,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和谐有序的政治生态浸润着信任的公共生活。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基于新媒体传播的公共事件频发,政治信任愈显脆弱。一个需要亟待回答的问题是:公众对互联网的使用,特别是以政治为目的使用是否影响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由于互联网使用包括多种形式(如信息获取、政治互动、表达和参与),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到底哪种或哪些使用活动影响到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分别如何?同时,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电视和报纸,这些“统一社会成员的思想,并驱使他们为自己(政府)的利益而奋斗”<sup>[8]</sup>的传统媒体,在当今媒体生态变革环境中,对塑造公众的政治信任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上述问题皆值得探究。本研究将首先从理论层面进行初步考察,理清研究思路,然后通过对一个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给出经验性的答案。

## 2 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 2.1 政治信任机制中的媒体因素

政治信任是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产生出与其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sup>[9]</sup>。作为一个社会“政治资本”的重要内容,政治信任是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基础。信任政府的公众更愿意相信政府将改善公民的生活,而不信任政府的公众认为政府只服务于少数特定的利益群体,认为政府是腐败、自私自利的。政治信任有多个层次,包括对政府官员的信任(人际信任)、对政府机构及公共部门的信任(组织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制度信任)。对中国政治信任的研究表明,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中,“层级越低,公众信任水平也越低”<sup>[10]</sup>。

政治信任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基于制度或政府绩效的视角,研究发现公众对国家经济状况、民主制度的评价,以及对腐败程度的评价影响政治信任水平;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则将社会信任、文化价值观作为政治信任的重要解释因素<sup>[7,11]</sup>。政府绩效体现在政府机构是否为公众提供了合格的公共物品,是否确保经济、社会运行的良好状态;公众是否信任政府乃是他们基于对政府行为的评价、对物质利益的计算结果,体现出理性选择。因此,“一个表现拙劣的政府是不可能赢得公民的信任的”<sup>[12]</sup>。不论在亚洲的韩国和我国大陆,还是港澳的经验研究都支持上述观点<sup>[12-14]</sup>。社会资本视角作为社会文化路径的理论解释,强调公众的政治信任源于社会化经历、文化与价值观,认为政治价值观和信念是被习得的,一般是早期生活经验的结果,与个人社会地位相联系。大陆和澳门的实证研究为其提供了经验证据<sup>[7,12]</sup>。唐文方认为在我国,制度信任不只是传统价值的产物,更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以对制度绩效的评价为基础,同时也是政府控制的政治化的产物<sup>[15]</sup>。史天健还发现,在民主化的台湾,政治信任更多地取决于政府绩效;而在大陆,政治信任更多源于传统的价值观<sup>[16]</sup>。

在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媒介化社会,公众被信息重重包围,高度依赖媒体,使得“民众关于政府官员能力与诚意的信念不来自直接经验,而由新闻记者来告知”<sup>[17]</sup>。政治社会化研究将媒体视为塑造公众政治态度的重要机构,认为媒体有助于公众分享关乎社会政治环境的共同知识、形成公意和提供意见表达、获取政策共识<sup>[18]</sup>。因此,媒体塑造公众的政治信任状态。具体而言,媒体至少通过两种路径影

响政治信任。

(1) 直接的认知效果 (Recognition Effect)。媒体对政府行为的呈现构筑公众头脑中政治世界的原材料。在新闻生产中, 记者以新闻价值为标准选择事实, 为获得发行量和收视率, 往往对能引起轰动的政治人物或事件 (特别是政治丑闻、贪污腐败) “高度再现”, 而对常规政治 “低度再现”。作为持续接触和使用媒体的结果, 公众往往对现实政治环境产生 “认知错位”, 对现实政治形成更多的负面评价, 导致政治信任下降<sup>[19]</sup>。此即 “媒体恶意论” (Media Malaise Thesis) 或 “丑恶世界效果假设” (Mean World Effect Hypothesis)<sup>[20, 21]</sup>。经验研究为负面认知效果论提供了证据。在美国, 研究揭示出政府官员和国会往往被媒体负面描绘、批评甚至攻击<sup>[22]</sup>, 从 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 这种呈现有渐增趋势<sup>[23]</sup>。Rozell 发现 1990 年代的媒体呈现出一个 “犬儒年代”, 美国人虽比以前更健康、长寿、富裕, 却觉得最美好的日子已经过去, 民众对政府机构与领导人的信心低至前所未有的程度<sup>[24]</sup>。在新西兰, Perry & Webster 发现超过 10% 的公众认为大部或几乎全部官员有受贿或腐败行为<sup>[25]</sup>; 但与公众认知相反, “透明国际” 清廉指数 CPI 显示新西兰一直是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sup>[26]</sup>。研究者将这种现实与认知背离的原因归结于媒体对官员的不平衡报道。如奈尔等人所指出的<sup>[27]</sup>, 在公众头脑中政府的尊严已严重恶化, 通过对媒体的使用和接触, 公众倾向于认为多数领导人是腐败自私的。基于本土的经验研究也发现, “由于 (媒体) 对各种腐败案例的广泛报道, 公众会形成一种政府与官员都是不诚实的、从而根本不值得信任的观念。”<sup>[28]</sup>

(2) 社会资本中介效果 (Mediated Effect)。公众的媒体使用行为被认为影响他们的社会资本, 而后者正是孕育政治信任的重要机制。Putnam 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的特性, 包括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 促进人们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达到互赢互利的目的<sup>[29]</sup>。一个健康的社会的必要条件是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存量<sup>[29]</sup>。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从公众非政治的社会互动之中发展出来政治后果<sup>[30]</sup>, 强调低水平的社会资本导致部分政治功能失调, 如公众参与下降, 削弱政治信任。福山则坚称 “社会信任感降低后, 意味着社会需要更具强制力、规范力的政府, 才能够约束社会关系<sup>[31]</sup>。” “媒体使用 → 社会资本 → 政治信任” 的思考路径包括两种取向: 消极效果和积极效果。 “时间替代假设” (Time Dis-

placement Hypothesis) 是一种消极效果观<sup>[21]</sup>, 认为媒体使用挤占人们对公共生活的投入, 削弱相互之间的信任, 造成社会资本降低, 最终有损于政治信任。 “媒体动员论” (Media Mobilization Theory) 是一种积极效果观<sup>[4]</sup>, 主张媒体和不断提升的教育水平有助于塑造 “知情的” (Informed) 社会, 增强公众政治兴趣, 提高政治认知能力, 最终动员他们参与公共事务。 “动员论” 强调媒体在公共生活中扮演启动 “良性循环” 的机制, 带动更高的政治信任<sup>[32]</sup>。经验研究分别为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论提供了支持。Putnam 对美国社会进行三十年追踪研究, 将政治信任降低归咎于电视的影响<sup>[21]</sup>。Cappella & Jamieson 也发现媒体使用造成社会资本下降, 使民众对政治的信任愈发低落, 连带影响参与或投票行为<sup>[17]</sup>。研究还指出媒体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因媒体类别而异——公众对电视的依赖越重, 政治不信任程度越高<sup>[33]</sup>, 报纸阅读却有助于提升政治信任<sup>[34]</sup>; 但阅读对政府持批判态度的报纸的公众, 政治信任水平要相对较低<sup>[35]</sup>。Newton 总结道, 是媒体内容而不是媒体形式决定其政治效果<sup>[36]</sup>。

与西方社会媒体扮演 “第四权力” 的角色不同<sup>[16]</sup>, 在我国, 媒体是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扮演 “耳目喉舌” 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 新闻媒体拥有了些许自主空间, 但这种由商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带来的 “新闻自由” 被认为是一种 “消极自由”, 这种自由仅能落实于非政治领域<sup>[37]</sup>。政府被认为通过管制媒体而塑造、操纵和限制民意<sup>[15]</sup>。西方传播学界关于 “涵化理论” (又称为 “培养理论”, Cultivation Theory) 的研究表明, 电视节目充斥的大量暴力内容, 大大增加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 (不安全感) 的判断, 接触电视较多者比接触较少者更容易认同电视所描绘的暴力世界。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展, 随后的涵化研究将重点放在电视内容对受众其他方面态度的影响, 这些研究都发现了一种被称之为 “主流化” 的媒体效果, 即电视所描绘的世界, 基本上存在一种普遍规律, 皆在灌输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价值观, 这种媒体上呈现的 “象征性现实” 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sup>[38]</sup>。在逻辑上, 我国的 “党管媒体” 体制在维系民众对政权和政治体制的支持方面, 常被认为具有类似于涵化意义上的 “主流化” 效果<sup>[8]</sup>。

然而在经验层面, 不同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比如, Chen 和 Shi 通过分析 1994 年的调查数据, 发现公众接触媒体对政府信任存在负面影响,



两位研究者据此认为,我国的政治宣传无法操控公众意见,也无法争取到他们的认同和支持<sup>[39]</sup>。不过,知名华人传播学者祝建华的研究表明,被限制的媒体在政治动员和教育民众方面具有强大效果,对维持公众的高政治信任有积极意义<sup>[40]</sup>。美国华裔政治学者唐文方也发现,经常使用媒体的公众更支持和信任现有政治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sup>[41]</sup>。近期,本土一项关于媒体与政治信任的研究观察到,接触利益表达内容的报道明显提升农民工的政治信任,而灌输型的宣传只达到很有限的效果<sup>[41]</sup>。总体上看,已有研究似乎更多地支持了传统媒体在维持民众积极政治态度方面的效果假设。

## 2.2 新媒体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平台

公众政治信任进程中的媒体因素,包括三种机制:信息传播、互动表达和公共参与。信息传播机制,是媒体作为政治信息的传播载体,为公众提供评价政府绩效的必要信息,为信任积累必要的认知基础;互动表达机制,是媒体为公众提供相互讨论和公共表达的平台,为公众和政府提供沟通的载体,公众形成对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经验感受和理性思考;公共参与机制,是媒体扮演促进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角色,介入政治事务的过程,有助于提升公民精神,孕育政治信任。

本研究对上述三种机制作出区分,主要是出于如下两方面的理由:其一,公众基于互联网或其他媒体渠道的政治信息获取,属于认知(Cognition)的范畴,与观点互动和态度表达存在本质区别。在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传统中,公众对公共事务领域信息的寻求、使用与处理行为,虽与许多政治或社会参与行为存在关联,但在许多研究的理论架构中,信息获取或认知变量往往处于逻辑链条的最前端,且被证实对信息处理及后续的参与行为拥有显著的影响,比如“传播中介模式”(Communication Mediation Model)、“认知中介模式”(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等<sup>[42-45]</sup>。其二,公众基于互联网的互动表达和公共参与两者之间,也有本质区别。根据亨廷顿和纳尔逊的观点,公共事务领域的参与是公众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关注试图影响政府的所有活动,而不包括公众表达出来的态度<sup>[46]</sup>。因此,从逻辑上讲,属于政治态度表达范畴的政治行动,不应该包含在政治参与行为之中。近年来,尽管已有一些学者将政治表达视为一种政治参与或政治行动(Political Activity),也有研究将此类

行动称为“表达性政治参与”(Exp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sup>[47]</sup>,但正如知名政治学者维巴等所言,朋友之间的政治讨论、与编辑的互动等意见表达行为,不能被视为政治参与行动,因为它们的目标对象不是政策决策者<sup>[48]</sup>。在传统上,这些行为也被称为政治表达(Political Expression)、政治态度表达(Political Attitude Expression)或舆论表达(Opinion Expression)等。尽管在民主制度发展不充分的社会表达性政治参与常常构成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实证研究表明,网上的表达性政治参与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被考察,它被证实是政治或公共参与行为,如政治动员、选举投票的前因变量<sup>[49]</sup>。

随着新媒体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它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政治信息传播、互动、表达和参与渠道。由于媒体管理体制的差异,互联网对中西方社会的政治具有不同的涵义。在我国,互联网的使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新闻性,尤其成为挑战与质疑官方声音的媒体,以及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同时,互联网也成为大量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平台<sup>[50]</sup>。然而,不论在西方还是本土学界,关于互联网如何影响公众政治信任的研究,还寥寥可数。

网上政治信息传播。信任源于了解和知情。公众的政治信任取决于他们对政府运作过程及绩效的认知,而后者取决于政治透明度。政治透明度是政府机构对政治活动的公开程度,也即公众对政治机构及权力运行状况的了解。沃伦认为在当今社会,有关官员的利益和表现的信息日益复杂、缺乏或难以得到,在缺少信息情况下,世故的公民将完全放弃信任<sup>[51]</sup>。在我国,媒体受到严格控制,新闻报道是政治权力层层“把关”下的信息生产。公众面对被控制的媒体,倾向于怀疑官方信息的可信性<sup>[52]</sup>。网络信息流通具有自由、海量、交互的特点,有助于打破政治传播系统的封闭性,减少传播层级,提高透明度<sup>[53]</sup>。这在理论上对培育公众信任有积极意义。然而,消极因素同时存在。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谣言通过互联网在素不相识的民众中传播<sup>[54]</sup>,调查显示,83.2%的被访者认为当前谣言很多,网络是最常见的传播渠道(85.8%)<sup>[55]</sup>。另一方面,网上大量关于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的负面信息在广泛传播。可以设想,网民越是接触上述内容,越可能滋生不信任感。此外,互联网也为公众提供了接触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声音的途径,许多网民通过代理服务器或“翻墙”突破信息疆界,获取跨国界的多元信息。接触“主流媒介”往往使公众共享一致的意识形态

观,“另类媒介”(Alternative Media)则具有启蒙与解放意义<sup>[56]</sup>,消解他们对政府的认同。这可能意味着公众越是通过互联网接触海外媒体,越对政治产生不信任。

网上政治互动与表达。在“全能型”国家时代,社会公众由下而上的表达极为困难,而互联网拓展了政治互动和表达的空间。“全球互联网项目”(WIP)通过比较各国资料,发现其他国家的多数受访者都不认为“通过使用互联网,人们对政府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只有中国是例外,60%以上的受访者同意该说法<sup>[57]</sup>。政治互动和表达对于我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是否有益、是否“涵化”公众积极的政治态度,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Wang 分析 2004 年“台湾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发现相对于在互联网上获取政治信息,在网上表达观点更能预测人们的政治态度;在网上搜寻政治信息刺激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却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无关,但在网上表达观点却与政治信任有关<sup>[58]</sup>。在我国大陆,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认为网络公民社会已然崛起,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参政议政功能凸显,越来越“从虚拟走向现实”<sup>[59]</sup>。也有学者针对公众的网上讨论、互动和表达,表露出悲观态度:“网络为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的广大人群提供了某种精神鸦片。大多数网民上网的目的不是谈论政治,而是阅读奇闻和流言、聊天交友、抒发个人情感和玩网络游戏。因此,网络在中国同时满足了人们参与和远离政治的欲望。”<sup>[60]</sup>

网上公共事务参与。政治信任绝非在真空中出现或运行,与公众介入社会政治过程的方式和程度密切相关。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维度,公共事务参与一般被认为与政治信任存在积极的联系,很少参与公共活动的个体可能对政府及其机构产生更负面的印象。“当公民很少参与公共生活和缺乏社会互惠体验的时候,他们也很难信任制约政治生活的制度”<sup>[61]</sup>,因为“社会成员之间的面对面的接触使得人们更好地了解对方,同时也允许他们将这种公民经历中的积极感受传播给社会及政府中的陌生人,使人们对社会和政府有更多的信任感。”<sup>[62]</sup>政治参与通过培育公民的规则和宽容意识,以及增强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自信心和乐观精神而提升政治信任<sup>[63]</sup>。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更可能互为因果。Gamson 认为政治不信任直接影响“非制度化”,往往也是成本较高的参与行为,如直接参与对抗政府的行为<sup>[64]</sup>。政治信任也更容易带来较低成本

的参与行为,如参加选举<sup>[65]</sup>。O'Brien 和李连江在我国农村的研究发现,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会增加村民“半制度化”的上访行为<sup>[66]</sup>。互联网被认为拓展了传统的政治参与途径,激发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并扩展政治参与的规模。常见的网络政治参与形式包括:与官员或公务员的线上沟通、网络问政、线上监督、网络信访、结社和利用网络发起的政治运动。网络政治参与已在切实影响和推动公共决策的过程、监督行政管理事务,拥有与传统政治参与类似的功能。本研究将网民以文本、语言、图片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参与视为“网上政治表达”,而将更具行动特征的参与形式(如网络问政、投票、监督、信访、结社)视为“网上政治参与”。

## 2.3 研究问题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不论从政府绩效还是社会资本视角,媒体因素皆可能对公众的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在我国,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政治信息、进行政治互动和表达以及介入政治过程的重要载体,意味着互联网在事实上扮演了公民政治社会化的角色。而且,当互联网全面融入公众的政治生活,很可能影响他们对传统媒体的态度和使用行为,进而改变传统媒体在塑造公民政治观念过程中的效果。有鉴于此,本研究考察以下两个问题:

(1) 公众对互联网政治性使用的多种形式,包括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公共参与,是否对他们的政治信任产生影响?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影响的具体强度和方向如何?

(2) 在互联网传播的环境下,公众对传统新闻媒体的政治性使用是否影响到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影响的具体强度和方向如何?

## 3 研究方法与变量描述

### 3.1 抽样与样本

本文通过对一项全国性网民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该调研的主题关乎公众的互联网使用及其社会政治效果。调查于 2010 年 12 月 26 日至 2011 年 1 月 16 日实施,采用便利样本的自填式问卷法,共邀请分布于全国各地,在年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三个人口学属性上分布于各层次的 1500 位公众填写问卷。具体过程为:30 名研究助理通过自己身边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共列出 1500 名可能愿意受到访问(且在年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三个指标上分布相对均衡)的被访者,

要求对方配合填写本问卷。其中,1200人受网上邀请,300人被网下邀请。如对方愿意配合且完成有效问卷,研究助理向对方赠送礼品表示答谢(此项研究于2011年底举行了第二波追踪调查,具体信息可向研究者索取)。最终回收110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927份。本文的分析选取其中的网民被访者,共计826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便利样本。在此样本中,被访者的平均年龄为28.3岁( $Sd=8.2$ ),男女性别分别占47.1%和52.9%。教育程度上,本科学历的被访者比例最大(32.8%)。收入水平上,自认为处于中下层(37.4%)和中层(37.3%)的被访者最多。59.1%的被访者处于单身/未婚状态,43.8%居住在省会城市。可见,样本偏向于学历较高、年龄较小的社会群体。尽管如此,该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几乎同期实施的“新媒体与我国沿海发达城市市民的媒体选择”调研(杜骏飞主持)样本的网民构成具有高度可比性<sup>①</sup>。

### 3.2 因变量

政治信任。本土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一般操作化为公民对各级政府的威信的认同度<sup>②</sup>,或从威信、公道、能力等方面衡量公众对某级政府部门的信任水平<sup>[66,68]</sup>。此外,政治信任具有不同层次的内容,既指向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制度,也指向国家机构,还指向官员和公务人员。在当前我国,公众在整体上对政治信任的硬核部分,即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拥有很高的认同,而对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的信任水平则因人而异<sup>[69]</sup>。有鉴于此,本研究测量公众对公务人员、官员和政府机构的信任。我们要求被访者在5级李克特量表上指出对以

下3个陈述的同意度:公务员们是不值得信任的、政府官员更关心自己的仕途而非我等老百姓所想、我对这个社会的执法和司法不信任<sup>③</sup>。其中,“1”代表“很不同意”,“5”代表“很同意”。这三个反向的陈述分别衡量被访者对公务员、官员和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被访者越是同意,则表明不信任的程度越高,越是不同意则表明信任的程度越高。

结果表明(图1),17.1%的被访者信任公务员,42.7%不信任;10.1%的被访者信任官员,63.9%不信任;对执法和司法机构,信任和 not 信任的比例分别是15.1%和46.4%。与此前一些研究的差异较大。胡荣等于2008年对厦门岛572位市民的调查显示,即使在公众相对不信任的基层政府一级,也仅有不足两成被访者否定街道办(17.2%)和区政府(14.2%)的威信,约三成表示肯定(25.5%,36.1%)<sup>[7]</sup>。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的调查也显示,总体上公众对各级政府“较信任”,对于“我们应该非常相信政府”的说法,约70%表示“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sup>[71]</sup>。

但本文的发现也与部分调查的结论有可比性。2011年,一份对厦门6个区798位市民的调查显示,64%的被访者对政府信息“不信任”,21.6%弱度信任,仅14.4%积极信任;53.1%对政治不信任,31.6%轻度信任,积极信任者为15.3%。同时,89%的被访者对官员不满意,9.4%“弱度满意”<sup>[72]</sup>。另两个具有可比性的调查出自影响广泛的《小康》报告<sup>[73]</sup>。该杂志2006年“信用度最低职业群体”调查发现,政府官员排在首位,63.68%的受访者“很不信任”当地官员,25%“不太信任”。翌年该杂志发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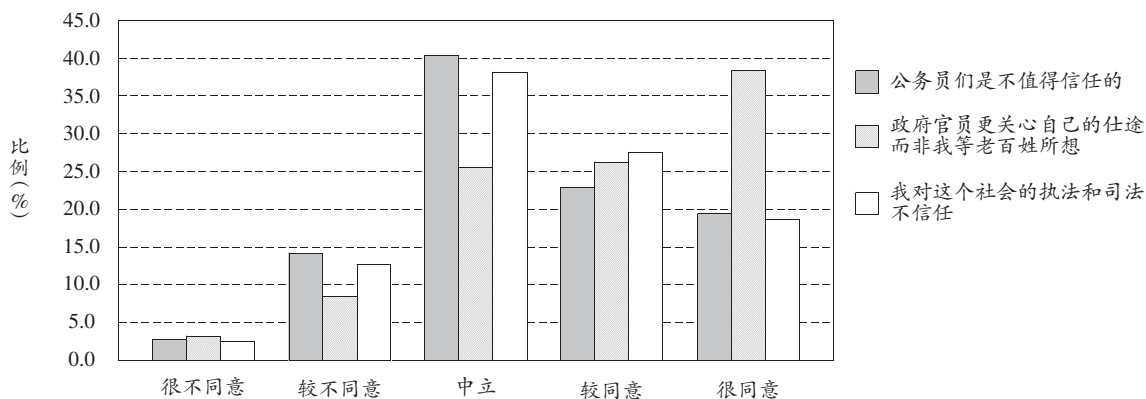


图1 被访者对公务员、政府官员和执法司法机构的信任现状

①关于具体数据,请参见杜骏飞教授课题组已在该调查基础上发表的成果。详见文献[67]。

②选择司法执法部门是因为,公众对执法人员的信任危机是影响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2006)曾对北京市1049位公众的调查表明,司法执法诚信是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详见文献[70]。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报告》显示,官员以 80.3%的绝对多数再次被评为信用度最低的职业群体<sup>[74]</sup>。较早一份具有可比性的研究,是由中宣部和中组部策划的调查,范围包括全国五十个城市,结果显示,只有两成民众信任党和政府的工作<sup>[75]</sup>。

因子分析显示在公务员信任、官员信任和司法执法信任三个项目中,仅有一个公因子存在,我们将其命名为“政治信任”(α=0.75)。在 1~5 级量表上公众政治信任的均值为 2.42(Sd=0.82),低于中间水平(3),说明在政治领域,整体上公众倾向于不信任的状态。本调查中被访者的政治信任相对较低,可能与如下因素有关:(1)三个项目代表了当前公众评价最低的信任对象,也就是说,本调查结果显示的是当今公众政治信任的最低水平;(2)被访者是相对年轻的网民群体,他们可能对政府持更加批评的态度。由于本文的目标并不在于描述政治信任的现状,而在于分析媒体使用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可能影响,故而,即使本调查的结果与其他研究不完全一致,但并不影响我们回答上文提出的两个研究问题。

### 3.3 自变量

网上政治信息获取。关注被访者通过网络获取政治信息的频度。列出两种常见的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方式:访问新闻网站(如新华网、新浪新闻)或政府部门网站、通过搜索引擎查找自己感兴趣的时政/社会事务信息(α=0.65)。要求被访者在 7 点李克特量表上选择进行相应网上活动的频率,其中“1”代表“从不”,“7”代表“很多”(表 1)。

网上“另类媒介”接触。衡量被访者通过网络访

问“另类媒介”的频率。“另类媒介”往往由于宣扬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声音而被封锁。鉴于该问题的敏感性,我们采用一种“迂回”的方式测量。询问被访者是否会“翻墙或使用代理服务”,选项为“完全不会”、“不怎么会”、“会”和“不确定”。如被访者选择“完全不会”和“不确定”,表明此人从未访问网上“另类媒介”;如选择“不怎么会”,表明他或她可能有时访问;如选择“会”,可能常常访问。结果显示,分别有 33.2%、35.4%和 27.6%的被访者“从未”、“有时”和“常常”在网上绕开封锁访问海外的网上“另类媒介”。

网上政治互动。考察被访者通过以下三种形式在网上与网友进行政治信息和观点的交互程度:浏览时政论坛或博客、转发时政网页/帖子、讨论时政事务(结果见表 1)。三个题项拥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α=0.73)。

网上政治表达。衡量被访者以网络为媒介表达对政治或公共事务的观点的频率。14%的被访者指出自己在 BBS/QQ 群/博客/微博上就时政/社会事务发表观点的频率较高,他们是网上政治表达的“活跃者”;23%选择“有一些”,其余 63%表达很少或较少。

网上公共事务参与。我们列举了五种常见的网上参与形式(α=0.92),要求被访者指出自己从事这些活动的频率。如表 1 所示,超过 10%的被访者从事第一种活动(监督政策或公共事件)的频率较高;至于其余四种形式(曝光不良作为、对话/建议、听证/投票、参加政治社区),参与“较多”、“多”和“很多”的比例之和,皆未超过 5%。

表 1 被访者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状况(%)

变量	项目	从不	很少	较少	有一些	较多	多	很多
信息获取	访问新闻网站(如新华网、新浪新闻)或政府部门网站	6.6	18.6	13.4	26.0	18.5	8.2	8.8
	通过搜索引擎查找感兴趣的时政/社会事务信息	5.0	11.0	13.5	33.4	22.9	8.0	6.3
政治互动	浏览时政性网络论坛(或综合论坛的时政版)或时政博客等	9.3	20.1	23.1	26.7	11.4	5.0	4.2
	转发或群发自己感兴趣的时政或公共事务信息网页/帖子	16.5	17.0	20.2	25.3	13.2	4.2	3.5
	与他人通过电邮/论坛 BBS/QQ 群等讨论时政/社会事务	23.2	24.4	23.2	18.6	6.1	2.7	1.9
政治表达	在论坛 BBS/QQ 群/博客/微博上就时政/社会事务发表观点	19.5	19.6	23.9	22.7	8.7	2.5	3.1
	通过网络质疑或监督某项政策的执行或某公共事件的进展	29.1	21.2	23.6	15.5	6.9	2.0	1.7
政治参与	检举或监督甚至曝光政府工作机构/人员的不良作为	47.8	23.2	16.4	8.4	3.0	0.8	0.5
	在网上与政治领导人或政府机构及其人员对话、提出建议	54.9	19.9	13.1	7.9	2.9	0.4	1.0
	通过网络参加听证会或参与对社会事务的投票	46.4	23.4	13.5	12.0	3.4	0.5	0.8
	加入时政或政治性网上社区/圈子以参加它们的活动	49.9	21.0	14.4	9.8	3.3	0.5	1.1

注:各行总和不一定等于 100%,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据以上结果,我们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互动和参与的各自指标(表1)加总后平均,可进一步得到,在1~7级量表上,被访者网上政治信息获取、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均值分别为3.99、3.15、3.02和2.01。这表明,信息获取是当前被访者相对常见的网络政治性使用形态,其次是互动和表达,最后是参与。至于“另类媒介”接触,我们将其单列出来处理。

传统媒体使用。关注公众对传统媒体政治性新闻内容的使用,包括对报纸和电视政治类新闻内容的接触度与关注度。报纸和电视接触,分别采用两个题项询问被访者一周中有几天接触该媒体上的社会和政治事务新闻(报纸: $\alpha=0.91$ ,  $M=2.36$ ;电视: $\alpha=0.90$ ,  $M=2.98$ )。对媒体关注度,分别采用两个题项询问被访者在阅读/收看报纸或电视社会和政治事务新闻时,关注的程度有多高(报纸: $\alpha=0.85$ ,  $M=3.77$ ;电视: $\alpha=0.81$ ,  $M=4.26$ )。

### 3.4 控制变量

社会资本。根据普特南的观点,社会资本包括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惠互利的规范。本研究聚焦社会信任(Social Trust)和公共参与(Civic Participation)两个维度。社会信任被很多学者认为是预测政治信任的重要指标。学界经常使用测量社会信任的指标是:“一般来说,你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以信任吗?”<sup>[11,76]</sup>我们要求被访者在5级量表上对“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是诚实的”的说法表明同意程度,数字越大表示越同意,即越信任他人。结果是,被访者对他人的信任仅稍稍越过中间线( $M=3.18$ )。对公共事务参与,要求被访者在7级量表上指出自己参加如下四种活动的频率:政府部门组织的听证会或民意调研等活动、在现实中与政府部门联系反映问题、找政府部门领导或工作人员提工作或政策方面的建议、给媒体写信或打电话反映自己的想法。四个指标拥有很高的内在一致性( $\alpha=0.90$ ,  $M=2.10$ )。

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公众对自己的参与行为可影响政治体系和政府决策的能力的评价,包含两个维度:内在和外在效能感。前者是个人对自己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能力的评价,后者是个体对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能影响政治决策的评价<sup>[77]</sup>。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增加往往推动对政府的认同与支持<sup>[78]</sup>。政府绩效是政府在社会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结果、效益及效能,体现出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

意志过程中的管理能力,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绩效<sup>[7]</sup>。外在政治效能感是公众对政府在政治绩效方面评价的表征,可以此来衡量政府绩效。对内在政治效能感的测量,采用如下两个陈述: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去理解政治事务,对各种社会事务我能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去参与;对外在政治效能,采用如下两个陈述:我国的决策体制对公众舆论的反应是积极有效的,政府部门/官员对公众舆论的反应是积极有效的。在5点量表上,“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对四个题项做因子分析,得到预期中的两个公因子,内部一致性 $\alpha$ 值分别为0.74和0.82。被访者的内部效能感( $M=3.28$ )明显高于外部效能感( $M=2.80$ ),呈较弱的正相关( $r=0.138$ ,  $p<0.001$ )。

政治兴趣。体现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感兴趣程度。不关注政治系统的公众往往认为“政治系统没什么问题”,关注公共政策与公职人员的公众则可能认为“问题比较多”<sup>[79]</sup>。本研究采用两个陈述构成的5点量表:我对在政府部门里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我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公共事务很感兴趣。“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量表的内在一致性 $\alpha=0.56$ ( $M=3.42$ )。

人际政治沟通。衡量被访者与身边亲人、朋友同事等对象的政治沟通频率。测量方法是询问被访者在一周中有几天和下列三类人讨论政治或社会事务:(1)家人/恋人、(2)同事/同学、(3)朋友/熟人( $M=2.15$ ,  $\alpha=0.66$ )。

互联网的使用经历和程度。受访者平均拥有7.49年的互联网使用经历( $Sd=3.42$ );每天上网时间为4.61小时( $Sd=3.14$ )。常用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社会结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经济地位(以家庭收入在社会中的层次作为指标)、居住地,也作为控制变量被纳入考察范围。

### 3.5 数据分析方法

首先,我们将调查数据录入到数据分析软件SPSS for Windows 17.0中,在经核查和初步整理后,对定距型变量的缺失值以“均值替代”方式处理;对离散型变量,采用“系统缺失”方式处理,以使相应个案不进入分析程序。

然后,为回答上文的问题,即分析公众互联网政治性使用的四种形式(共五个变量)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并分析电视和报纸政治类新闻内容使用对



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我们将分别以政治信任总指标及其三个项目为因变量,在控制住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社会结构变量,以及社会资本、内外政治效能感、政治兴趣、人际政治沟通等变量后,再将自变量,即互联网使用和传统媒体使用引入多元回归方程,通过考察它们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以确定新旧媒体使用因素对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

#### 4 研究发现

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包括信息获取、互动、表达和参与;但很明显,互联网使用在各社会群体中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人们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我们以互联网政治性使用的四种形态为因变量,以人口学和社会文化变量、传统媒体政治性使用和人际政治讨论、政治态度和公共参与,以及互联网使用因素作为自变量,执行多元阶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在整体上,男性、人际政治讨论频率高、内在效能感强、公共事务参与多及互联网使用程度高的被访者,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更加频繁。我们更关注被访者传统媒体政治性使用与互联网政治性使用间的关系。尽管传统媒体使用和人际政治讨论阶层的五个自变量对各因变量的解释方差都达到显著水平(方差贡献率从1.5%到10.1%),但意外的是,被访者对报纸和电视政治性新闻内容的接触和关注,几乎与他们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不存在显著关联。唯一的例外是,对报纸政治类新闻关注度高的人更可能在网上参与政治事务。这至少说明,

对本调查的被访者而言,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其政治意义是不同的。与传统媒体因素的表现不同,人际政治讨论与互联网政治性使用的四个变量都存在积极联系。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与身边人讨论政治事务较多的被访者,更可能在网上获取政治信息、接触海外的网上“另类媒介”、在网上进行政治互动及表达自己的观点。被访者在网下参与公共事务越多,越可能付诸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行为。这说明公众在网下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以多种形式延伸到网络空间——特别是网上的政治互动、表达和参与,网下参与的相对解释力要远超其他自变量,标准化 $\beta$ 值分别达0.322( $p<0.001$ )、0.327( $p<0.001$ )和0.547( $p<0.001$ )。另外,在控制住上述各阶层的变量之后,每天使用互联网时间长的被访者,更可能以政治为目的来使用互联网。

为回答本研究提出的问题,我们将被访者对公务员、官员和司法执法机构的信任,以及总体政治信任作为因变量,将人口学和社会结构变量、控制变量和自变量分别作为多个阶层的预测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结果如表3所示。

人口学和社会结构变量为第一阶层。只有社会经济地位对四个因变量都有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被访者,对公务员、官员、司法执法机构越信任,总体政治信任也越高。教育程度对因变量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不显著。这与西方已有研究一致<sup>[80]</sup>,却与本土研究不完全相同。比如,胡荣等在厦

表2 预测被访者互联网政治性使用的多元阶层回归分析结果

	网上政治 信息获取	网上“另 类媒介” 接触	网上政治 互动	网上政治 表达	网上公 共事务 参与		网上政治 信息 获取	网上“另 类媒介” 接触	网上政治 互动	网上政治 表达	网上公 共事务 参与
年龄	-0.020	-0.158**	-0.093	-0.075	-0.137**	报纸政治新闻接触	-0.026	-0.004	-0.069	-0.053	0.036
性别(男)	0.119***	0.216***	0.113***	0.078**	0.108***	电视政治新闻接触	0.057	-0.021	0.042	-0.040	0.018
婚姻状态(未婚)	-0.031	0.121*	0.059	0.090#	0.022	报纸政治新闻关注度	0.088#	0.042	0.086#	0.021	0.093*
教育程度	0.193***	-0.002	0.061#	-0.024	0.046	电视政治新闻关注度	0.090#	-0.024	0.024	0.059	0.003
政治面貌(党员)	0.032	0.001	0.059#	0.002	-0.017	人际政治讨论频率	0.134***	0.103**	0.143***	0.079**	-0.005
社会经济地位	0.019	0.055	-0.018	-0.050	-0.008	$\Delta R^2\%$	10.1***	1.5*	8.5***	3.2***	4.9***
居住地(城市)	-0.006	0.063#	0.013	0.041	-0.046	政治兴趣	0.131***	-0.038	0.107**	0.047	-0.025
$\Delta R^2\%$	13.6***	12.0***	10.2***	6.6***	7.4***	内在效能感	0.147***	-0.008	0.125***	0.166***	0.062*
互联网使用经历	0.028	0.133***	0.103**	.089**	0.046	外在效能感	-0.070*	-0.046	-0.012	-0.034	0.011
互联网使用程度	0.101**	0.059#	0.105***	.120***	0.083**	网下公共事务参与	0.079*	0.198***	0.322***	0.327***	0.547***
$\Delta R^2\%$	1.1**	2.0***	2.2***	2.3***	0.9**	$\Delta R^2\%$	4.8***	4.0***	13.2***	13.5***	28.9***
调整后 $R^2\%$	27.8***	17.5***	32.4***	23.7***	40.6***	有效样本量(N)	740	740	740	740	740

注:表中数字为标准化 $\beta$ 值;#表示 $p<0.10$ ;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01$ ;表3之注释相同。

门的调查发现,男性、教育程度高者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收入水平与信任度之间却没有关系<sup>[7]</sup>。

第二个阶层是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和人际政治讨论。除了电视政治新闻关注度对司法执法机构信任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beta=.159, p<0.01$ ),各变量对四种政治信任指标都没有显著的解释力(标准化 $\beta$ 值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传统媒体电视和报纸对维持当前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并不存在明显的积极效果。与此前的相关研究不同<sup>[15,39-41]</sup>,我们的数据揭示出,在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仅有极其微弱的效果。

第三阶层包括政治兴趣、内在效能感、外在效能感、公共事务参与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其中,外在效能感表征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公共事务参与和社会信任表征社会资本。被访者内在效能感越强,政治信任水平越低( $\beta$ 值为负)。外在效能感越强的被访者(即政府绩效评价高),信任水平越高( $\beta$ 值为正)。在网下参与公共事务多、社会信任水平高的被访者,拥有更高的政治信任。这与此前研究的发现一致<sup>[4,7]</sup>。

最后是自变量阶层。除了司法执法信任,该阶层对政治信任其他三个指标的方差贡献率超过2%,且是显著的。被访者的互联网使用经历、程度与政治信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我们所关注的表

征互联网政治性使用的五个变量中,仅有网上“另类媒介”接触和网上公共事务参与对因变量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首先,被访者网上“另类媒介”接触与政治信任的四个指标之间,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越多接触被封锁的海外网站,越对政治不信任(标准化 $\beta$ 从 $-.086$ 到 $-.122$ ,皆达到显著水平)。其次,在网上参与公共事务越频繁的被访者,对公务员的不信任程度越高( $\beta=-.156, p<0.01$ ),也拥有越低的总体信任水平( $\beta=-.108, p<0.05$ )。网上公共事务参与对官员信任( $\beta=-.045$ )、司法执法信任( $\beta=-.050$ )的影响是消极的,但未达到显著水平。另外,被访者越频繁地在网上获取政治信息、越多地通过网络表达观点,总体政治信任越高,越信任公务员和官员,对司法执法的信任却越低,但这些影响并不显著,只是揭示了一种可能的影响方向。不过,网上政治表达对公务员信任的积极影响,已接近边缘显著水平( $\beta=.088, p=0.104$ )。

网上政治互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模式,与信息获取和表达的影响正好相反。越是频繁地在网上进行政治互动的被访者,总体政治信任越低( $\beta=-.041$ ),对公务员( $\beta=-.071$ )和官员( $\beta=-.112$ )的信任水平越低,对司法执法机构的信任( $\beta=.076$ )水平却越高,但皆未达到显著水平。不过,该变量对官员信任的负面影响,已接近边缘显著水平( $p=0.103$ )。

表 3 预测被访者政治信任水平的多元阶层回归分析结果

	公务员信任	官员信任	司法执法机构信任	政治信任总指标		公务员信任	官员信任	司法执法机构信任	政治信任总指标
年龄	-0.064	-0.079	-0.061	-0.078	互联网使用经历	0.003	-0.006	-0.003	0.001
性别(男)	0.056	0.020	-0.049	-0.007	互联网使用程度	-0.031	0.038	0.002	0.016
婚姻状态(未婚)	0.072	0.086	0.111**	0.105*	网上政治信息获取	0.071	0.054	-0.069	0.024
教育程度	-0.023	0.002	-0.076*	-0.052	网上“另类媒介”接触	-0.086*	-0.122**	-0.099*	-0.112**
政治面貌(党员)	0.043	0.018	0.040	0.058	网上政治互动	-0.071	-0.112 <sup>(b)</sup>	0.076	-0.041
社会经济地位	0.105**	0.077*	0.088*	0.089*	网上政治表达	0.088 <sup>(a)</sup>	0.073	-0.068	0.044
居住地(城市)	-0.034	0.040	-0.002	0.009	网上公共事务参与	-0.156**	-0.045	-0.050	-0.108*
$\Delta R^2\%$	3.2***	2.5**	4.9***	4.3***	$\Delta R^2\%$	2.6**	2.1*	1.6*	2.0*
报纸政治新闻接触	-0.011	-0.040	0.079	0.007	政治兴趣	-0.033	-0.066*	0.005	-0.036
电视政治新闻接触	0.045	0.071	-0.076	0.001	内在效能感	-0.106**	-0.127***	-0.134***	-0.152***
报纸政治新闻关注度	0.010	0.089*	-0.056	0.019	外在效能感	0.222***	0.234***	0.118**	0.234***
电视政治新闻关注度	0.014	-0.077	0.159**	0.045	网下公共事务参与	0.149***	0.169***	0.095*	0.172***
人际政治讨论频率	-0.033	0.011	-0.013	-0.006	社会信任	0.116**	0.091*	0.115**	0.132***
$\Delta R^2\%$	0.9	0.8	1.9**	1.1	$\Delta R^2\%$	7.8***	9.6***	4.8***	10.5***
调整后 $R^2\%$	11.7***	12.2***	10.3***	15.2***	有效样本量(N)	740	740	740	740

注:(a)  $p=0.104$ , (b)  $p=0.103$ 。

##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媒体对民众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即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的基本判断,本研究以近期一份全国性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互联网作为网民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

在政治信任水平的描述层面,本研究发现,当前网民的政治信任水平较低,被访者对公务员、官员和司法执法机构的信任程度评价,整体上处于“不信任”状态。这令人忧虑,需要引起警觉。因为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与权威在于它拥有公民的信任<sup>[51]</sup>,当“政府失去公众信任后,说真话、做好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sup>[81]</sup>。然而,多个实证研究表明,当前公众的不信任并不指向政治共同体的宏观层面<sup>[82]</sup>,公众对中央政府仍拥有较高信任度<sup>[7,10]</sup>。换句话说,当前公众的政治信任流失,主要是针对地方政府及部分公职人员和公共政策,这使得在当前修补缺损的民众政治信任,存在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空间。

在对公众的政治性互联网使用以及政治信任多变量分析的解释层面,本研究的发现主要在以下三点:

(1)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在预测网民的网络政治性使用方面没有明显效果。我们发现,被访者对报纸和电视这两种传统媒体的政治性新闻内容接触和关注,几乎与他们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不存在显著关联。唯一的例外是,对报纸政治类新闻关注度高的被访者,更可能在網上参与政治事务。与传统媒体政治性使用的情形不同,网民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政治讨论与他们的网络政治性使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更多地与身边人讨论政治事务的被访者,更可能在網上获取政治信息、接触網上“另类媒介”、在網上进行政治互动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似乎表明,在预测公众的网络政治性使用行为方面,人际传播渠道与传统新闻媒体具有不同的性质。

(2)网民的传统媒体政治性使用对他们政治信任水平的贡献微乎其微。按照不少学者的解释<sup>[15,40-41]</sup>,我国党和政府对传统媒体的严厉控制,对于提升和维持民众的高政治信任和政治支持具有积极效果。但我们的数据揭示出,在当今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政治性使用,几乎无法预测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也就是说,传统的主流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贡献微乎其微。

(3)网民对互联网的各种政治性使用形态,对他们的政治信任产生了多重效果。首先,被访者的互联网使用经历、程度与政治信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是整体上网络使用行为的一种“无效果”(Null Effects)。其次,被访者在网上的“另类媒介”接触、网上公共事务参与对他们的政治信任水平拥有消极的影响(Negative Effects)。再次,被访者的网上政治表达(积极)和互动(消极)两种使用行为,表现出了对不同政治信任指标的差异化效果(Differential Effects)。这表明,在解释我国民众的政治态度方面,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展现出了复杂而多元的效果机制。

以上三方面的结论表明,电视和报纸对维持当前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已没有明显效果,无法“涵化”公众积极的政治态度。这体现出在媒体转型态势下,传统媒体政治功效发挥的现实困境。在传播实践方面,传统媒体需要注意,在新媒体环境下,如果不重视网民的媒体接触心理和习惯,传统媒体中严肃庄重的主流政治话语往往将退缩为媒体的自说自话,而网民也很可能以俏皮甚至恶搞的方式消解崇高<sup>[83]</sup>。

与此相反,网络空间的政洽话语和人际渠道的政治表述,作为独立于官方话语之外的“在野”的话语体系,却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网民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政治讨论与其网络政治性使用之间存在显著的积极联系,这表明对民众而言,作为政治沟通的渠道,网络空间和人际传播具有与传统媒体不同的特征,二者对网民政治心态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效果——以政治信任作为观测变量,至少新媒体互联网已体现出对传统媒体的“挤迫效应”。

然而,我们也不必因此而过分夸大互联网在我国政治领域的消极影响。国外研究声称,我国政府正在适应信息时代的来临,且体会着其中的优越性——没有证据表明新媒体正在严重破坏中国的国家权威,或者形成了明显的政治挑战<sup>[84]</sup>。他们认为,目前还不能证实互联网侵蚀了我国政府的权力。本研究发现,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已威胁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但情形还远未达到严重的境地。首先,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表现为一个多元而复杂的结构;其次,即使考虑到存在的负面影响,影响力仍然相当微弱,还远不能和其他有着积极效果的变量(如外在效能感、网下公共参与、社会信任等)相比。

本研究也为政府绩效和社会资本对政治信任



存在积极影响的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经济增长被证实是决定我国民众政治信任状况的首要因素<sup>[12]</sup>。相对于社会资本,政府绩效是更具解释力的预测因素。在此意义上,政府部门有必要从这两种视角出发,为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探寻有效的对策。

本研究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

(1)样本对全国网民不具较好的代表性。本研究以便利抽样方式获得被访者,结果显示,被访者整体上偏向于低龄化(平均年龄为 28.3 岁),难以反映我国网民政治信任、互联网使用和传统媒体使用的基本现状,甚至更进一步影响到对媒体使用与政治信任之间关系的分析。

(2)对部分概念的测量,有待进一步改善。本研究对政治信任的测量,只关注到民众对官员、司法执法部门和公务员的信任状况,而未考虑到更多层次的信任对象。另外,对于政府绩效的测量,采用以外在政治效能感作为替代性测量的方法,值得在理论和实证上进一步商榷。

本研究揭示了当前我国网民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对其政治信任的复杂而多元的影响格局。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就民众互联网政治性使用的某种特定形态(如政治认知或政治表达)对他们政治态度或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性考察。同时,考虑到近年来各种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日渐深入<sup>[85]</sup>,公众社会化媒体的政治性使用与其政治态度及线上线下政治行动的关系,则是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 参考文献

- [1] 国际先驱导报. 怀疑成中国人生活方式 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被相信[EB/OL]. (2011-1-17)[2011-12-15] <http://news.cntv.cn/society/20110117/104339.shtml>.
- [2] 王亚欣. 提升政府公信力[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3-16(5).
- [3] ROBINSON M J. Televis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1956-1976[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7, 51(1): 174-189.
- [4] NORRIS P.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5] SUN T, CHANG T K. Social Structure, Media System, and Audiences in China: Testing the Uses and Dependency Model[J].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1, 4(2): 199-217.
- [6] 人民日报. 网络舆情监测显示民众对政府专家及媒体信任度低[EB/OL]. (2011-9-8)[2011-10-11]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5616025.html>.
- [7] 胡荣, 胡康, 温莹莹.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 社会学研究, 2011(1): 96-117.
- [8] 喻国明.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与特点[J]. 新闻学研究, 1997(55): 272-290.
- [9] MILLER A H.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1964-1970[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4, 68(3): 951-972.
- [10] LI L.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J]. Modern China, 2004, 30(2): 228-58.
- [11] 马得勇. 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 8 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7(5): 79-86.
- [12] WANG Z.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5, 15(1): 155-71.
- [13] KIM J Y. "Bowling Together" Isn't a Cure-A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South Korea[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5, 26(2): 193-213.
- [14] 熊美娟. 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以澳门为例[J].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1(4): 77-87.
- [15] 唐文方. 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M]. 胡赣栋, 张东锋, 译.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
- [16] SHI T J.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J].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1, 33(4): 401-19.
- [17] CAPPELLA J N, JAMIESON K H.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8.
- [18] 张昆. 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 [19] DELLI CARPINI M X. Mediating Democratic Engagement: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s on Citizens'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and Civic Life[C]//KAID L L.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ahwah, NJ: LEA, 2004: 395-434.
- [20] BENNETT S E, RHINE S L, FLICKINGER R S, etc. "Video Malaise" Revisited—Public Trust in the Media and Government[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999, 4(4): 8-23.
- [21]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 6: 65-78.
- [22] VILES P. Hosts, Callers Trash Clinton on Talk Radio[J]. Broadcasting and Cable, 1993, 12: 43.
- [23] PATTERSON T E. Out of Order[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 [24] ROZELL M. Press Coverage of Congress: 1946-1992[C]//MANN T, ORENSTEIN N. Congress,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American Enter-

- prise Institute, 1994: 59-129.
- [25] PERRY P, WEBSTER A. New Zealand Politics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Attitudes and Values abou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M]. Auckland: Alpha Publications, 1999.
- [26] BARNES C, GILL D. Declining Government Performance? Why Citizens Don't Trust Government[R]. New Zealand State Services Commission, 2000.
- [27] NYE J S, ZELIKOW P D, KING D C.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8] 柯红波. 腐败与公众信任——基于政府官员的调查与解读[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9(6): 72-78.
- [29] 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0] NORRIS P. 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31] 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 李宛蓉, 译.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373.
- [32] SHAH D V, HOLBERT L R, NOJIN K. Expanding the 'Virtuous Circle' of Social Capital: Civic Engagement, Contentment, and Interpersonal Trust[R].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New Orleans, LA, 1999.
- [33] BECKER L B, WHITNEY D C. Effects of Media Dependencies: Audience Assessment of Government[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0(7): 95-120.
- [34] MOY P, PFAU M. With Malice toward All? The Media and Public Confidence i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2000.
- [35] MILLER A H, GOLDENBERG E N, ERBRING L. Type-Set Politics: Impact of Newspapers on Public Confidence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9, 73(1): 67-84.
- [36] NEWTON K. Mass Media Effects: Mobilization or Media Malaise? [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9, 29(4): 577-599.
- [37] 李金铨. 从儒家自由主义到共产资本主义[C]//李金铨. 超越西方霸权: 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4: 80-84.
- [38] MCQUAIL D, WINDAHL S. 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M]. London: Longman, 1993.
- [39] CHEN X, SHI T.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J].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001, 19(3): 84-118.
- [40] 祝建华. 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 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J]. 新闻学研究, 2001(68): 1-21.
- [41] 董毅. 基层民众的媒介接触与政治信任[D]. 上海: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1.
- [42] MCLEOD J M, SCHEUFELE D A, MOY P.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in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99, 16: 315-36.
- [43] EVELAND W P. The 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 of Learning from the News: Evidence from Non-Election, Off-Year Election,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ntexts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1, 28: 571-601.
- [44] SHAH D V, CHO J, NAH S, et al. Campaign Ads, Online Messaging, and Participation: Extending the Communication Mediation Model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57: 676-703.
- [45] EVELAND W P, SHAH D V, HWANG H. Assessing Causality in the Cognitive Mediation Model: A Panel Study of Motivation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Learning during Campaign 2000[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3, 30: 359-386.
- [46] 亨廷顿, 纳尔逊. 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 汪晓寿, 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5-7.
- [47] PUIG-I-ABRIL E, ROJAS H. Internet Use as an Antecedent of Express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Early Internet Adopters in Colomb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net Science, 2007, 2: 28-44.
- [48] BERBA S, SCHLOZMAN K L, BRADY H E. Voice and Equality[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9] ROJAS H, PUIG-I-ABRIL E. Mobilizers Mobilized: Information, Expression,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Age[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9, 14: 902-927.
- [50] 郭小安. 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J]. 理论探索, 2008(3): 127-129.
- [51] 沃伦. 民主与信任[M]. 吴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22-24.
- [52] BAUER R A, GLEICHER D B.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53, 17(3): 297-310.
- [53] 潘祥辉. 去科层化: 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1): 36-43.
- [54] 胡泳.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9(9): 67-94.
- [55] 中国青年报. 逾八成人称现在社会谣言很多 因官方信息不透明[EB/OL]. (2011-9-8)[2011-11-15]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9-08/3314052.shtml>.
- [56] 周葆华, 陆晔. 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 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J]. 新闻大学, 2008(4): 58-66.
- [57] 郭良.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民意的影响[EB/OL]. (2004-

- 4-26] [2006-5-5] <http://www.usc.cuhk.edu.hk/wk-wzdetails.asp?id=3329>
- [58] WANG S. Political Use of the Internet,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17(4): 381-395.
- [59] 刘学民. 网络公民社会的崛起——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J]. 政治学研究, 2010(4): 83-90.
- [60] 胡泳. 博客在中国[EB/OL].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8(9). (2008-9-30) [2010-3-15]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8036g.htm>.
- [61] KEELE L J. The Authorities Really Do Matter: Party Control and Trust in Government[J]. Journal of Politics, 2005, 67(3): 432-451.
- [62] 梁莹. 基层政治信任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7.
- [63] 闫健. 居于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信任——兼论当代中国的政治信任[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1): 26-31.
- [64] GAMSON W A.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Dorsey Press, 1968.
- [65] SHINGLES R D. Black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Missing Link[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1, 75(1): 76-91.
- [66] O'BRIEN K J, LI L.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67] 李亚好. 互联网使用、网络社会交往与网络政治参与——以沿海发达城市网民为例[J]. 新闻大学, 2011(1): 69-81.
- [68] 孙昕, 徐志刚, 陶然, 苏福兵. 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和村民选举参与——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调查的实证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7(4): 165-187.
- [69] 上官酒瑞, 程竹汝. 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及其现实启示[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5): 99-105.
- [70] 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 北京市民对社会诚信问题的态度[EB/OL]. 中国民意网, (2007-7-16) [2009-8-1] <http://www.minyi.org.cn/Article/diaochabaogao/200707/40.html>.
- [71] 钟其. 我们的政府值得信任吗? ——有关政府信任度的问卷调查[J]. 观察与思考, 2011(3): 24-25.
- [72] 姚金伟. 权力运行的脱节与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分析[EB/OL]. 求是理论网, (2011-11-9) [2011-12-1] [http://www.qstheory.cn/zz/xsyj/201111/t20111109\\_122477.htm](http://www.qstheory.cn/zz/xsyj/201111/t20111109_122477.htm).
- [73] 秦海霞. 信用小康三忧一喜[EB/OL]. 人民网, (2006-10-12) [2009-10-01]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71979/71980/4910531.html>
- [74] 小康研究中心. 官员信用敲响政务信用警钟[J]. 领导文萃, 2008(3): 36-40.
- [75] 程倩. 政府信任关系: 概念、现状与重构[J]. 探索, 2004(3): 35-38.
- [76] ZHANG W, CHIA S C. 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Use and Social Capital on Civic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 Communication Studies, 2006, 57(3): 277-197.
- [77] ABRAMSON P.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 [78] MALIK Y K. Trust, Efficacy, and Attitude toward Democracy: A Case Study from India[J].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979, 23(3): 433-442.
- [79] 彭心安. 阶层分化与各层政治信任差异分析[J]. 厦门特区党校学报, 2010(5): 3-7.
- [80] ABERBACH J D, WALKER J L. Political Trust and Racial Ideolog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0, 64: 1199-1220.
- [81] 人民日报. 执政党和政府如何提高修复公民对政治不信任的能力[EB/OL]. 新华网, (2011-11-9) [2011-12-1]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09/c\\_111154039.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11/09/c_111154039.htm).
- [82] 上官酒瑞. 现代政治信任建构需要新理念[J]. 学习时报, (2011-5-30) [2011-12-5]. [http://theory.gmw.cn/2011-07/06/content\\_2191467.htm](http://theory.gmw.cn/2011-07/06/content_2191467.htm).
- [83] 李永刚. 我们的防火墙: 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M].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50.
- [84] 范士明. 新媒体和中国的政治表达[EB/OL].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8(3). (2008-3-31) [2009-5-15]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703076g.htm>.
- [85] 陈先红, 张明新. 中国社会化媒体发展报告 2013[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



policy orientation in urbanization.

**Article Type:**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New-type Urbanization, "Galactic" Model, Evaluation Indicator

#### (8) The Dual Effects of Enterprise Annuity on Pension Inequality

*Guo Lei, Su Taoyong ·75·*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ID:** 1672-6162(2014)01-0075-E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enterprise annuity on pension inequality among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that between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quantitatively with salary inequality affecting employees' contributions to enterprise annuity. Using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s simulations, the paper simulates 23 policy portfolios and predicts relative pensions and inequality based on 14 representative employees with different sala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terprise annuity will widen pension inequality among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narrow that between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in which the widen-effect dominates. Tax preference will enlarge enterprise annuities' effects and increasing enterprise income tax exemption cap for employers' contribution makes the most. Salary inequality widening, investment returns increasing, management fees decreasing, remaining lifetime decreasing, social average salary growth rate increasing and working time increasing will also enlarge the effects, and vice versa. And it is better off than taxing on employers' contribution into personal account that contribution salary less than 3 times of social average salary or contribution scale less than 10% to narrow pension inequalit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omplicated effects of enterprise annuity on pension inequality based on salary heterogeneity, which help to better enterprise annuity policies.

**Article Type:**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Pension Inequality, Salary Heterogeneity, Tax Preference, Enterprise Annuity

#### (9) Political Internet Use and Chinese Public's Political Trus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Zhang Mingxin<sup>1</sup>, Liu Wei<sup>2</sup> ·90·*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D:** 1672-6162(2014)01-0090-EA

**Abstract:** As the new media Internet have gradually used by more and more individuals for political purpose in China, including political recognition, discussion, express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empirically explore the poten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ublic's political Internet usage and their political trust. All the data used in this paper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survey administrated to a conveniently selected sample, through 26th December 2010 to 16th January 2011. The sample consists of 826 Internet users. Internet users have a relatively low governmental trust level generally. Individuals who visit overseas alternative websites and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online more frequently have lower political trust. However, we have not found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between respondents'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discussion, expression and their political trust level. Data revealed that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a (e.g., newspaper, television, broadcast, and magazine) have almost no effects on cultivation of public's positive political attitude. This study have two main limitations. The first is sampling method. A convenient sample isn't sufficient to discov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public's political attitude. The second involves th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trust. Future research requests elaboration of operationalization of this concept.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caution the government paying more attention upon public's political trust, especially in the new media era. Since traditional media have almost null effects on fostering public's political trust, it is necessary for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to develop effective ways online in government-public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society, media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variable influencing trust level in the public arena. Integrating two different explanation models of political trust – recognition effect of media usage and mediated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this study, for the first time, discovers complex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internet use in Chinese public's political trust perception.

**Article Type:**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Media, Political Trust, The Internet, Social Capital

**(10)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Public Trust in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New Media Age: Transparency, Responsiveness or Public Relations?**

*Ma Deyong, Sun Mengxin · 104 ·*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D:** 1672-6162(2014)01-0104-E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factors which are expected to influence public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with the advent of new media. W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public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factors of transparency 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b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relations and trust in local governments is uncertain. This article tests this hypothesis using statistical data issued by the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Studio of People's Daily Online (Renmin Wa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ransparency and responsiveness of local governmen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public trust in the local governments figured in the data. However, contrary to the view held by many Chinese scholars that improved public relations will lead to greater credibility for local governments, these results reveal that local government abilities in public relations bears little relationship to public perceptions of credibility. Based on the result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local governments on building public trust.

**Article Type:**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ust, Public Credibility, Transparency, Responsiveness, Public Relations, New Media

**(11) Tentative Assessing to Chinese Governments' Service Performance: A Network Field Experience Evaluation to the City Governments' Service of Provincial Level**

*Shang Huping, Zhao Panpan · 114 ·*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D:** 1672-6162(2014)01-0114-EA

**Abstract:** How to evaluate the government service performance has become a hot potato to the practitioners